



中国民主党派
地位的
历史演变

程珏 著

花 科 出 版 社

PDG

序

在中国民主党派历史研究的领域中，《中国民主党派地位的历史演变》一书，另辟蹊径，从历史地位的演变中，探索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产生发展过程，显示各民主党派半个多世纪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和贡献，给我们以新的历史启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谭平山等建立的第三党是我国最早的民主党派组织。第三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政党，主张用革命武力推翻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在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他们仍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为此，这些中间阶级及其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可以而且应该争取团结的力量。第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以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营垒内，有效地开展武力反蒋活动，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客观上配合了中共的工农武装斗争。这说明像第三党一类的中间阶级的革命党派在组织领导国统区城市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及分化敌人、争取同盟者方面，有着中共不可直接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中共开展国统区革命斗争所必须依靠的力量。第三党不理解中国共产党在

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亦反对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为此，第三党只能孤军作战而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这又说明了弱小的中间阶级及其政党只能依靠与中共的合作，以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为后盾，才能确保其在中国革命中应有的地位和发挥积极的作用。

总之，第三党的成立，标志着在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阶级中，一种以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传统为己任的爱国民主政党的出现。第三党短暂的武力反蒋活动亦揭示了中国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同时也预示了这种历史地位演变的历史轨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全国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救亡运动。在此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势力在抗日反蒋的旗帜下，开始集结起来，组成了具有政党色彩的救亡团体，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有一些一向从事社会改良的团体，如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也在投身救亡运动中，开始向抗日救亡的政治团体的方向转化。而原有的一些中间党派如第三党、国社党、青年党均以抗日救亡为党的中心任务。这样，一批爱国的民主党派迅速崛起，并成为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直接组织者。这些抗日党派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发挥了一定作用。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局面正式形成。尽管国民党继续坚持其“党外无党”的一党独

裁政策，但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居于在野地位的各民主党派也在实际上获得了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由此，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有所扩大，它们在不断的分化组合之中，成为了中国抗日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这期间，民主党派人士有机会与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接触和经常交往，对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争取抗日民主和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中，民主党派是更多地与中共站在同一战线上，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1943年，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从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开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和战后和平建国时期为止，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是在最后战胜日寇的同时，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所鼓舞，以及对实现国家民主化的向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分子纷纷组建新的民主党派组织。当时，各民主党派是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种政治势力，它们在充当国共两党之争的调停角色的同时，希望利用国共之间的矛盾，去实现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但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斗中，各民主党派又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同中共并肩作战，为实现和平民主建国而努力。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企图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同时对各民主党派施以暴力镇压。民主党派成为非法的在野党，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其他民主党派的活动也转入了地下。从此，民主党派抛弃了充当第

三种政治力量的立场，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行列。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全面的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统治的灭亡指日可待。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开展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各民主党派立即一致响应中共的号召，其主要领导人和有关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的组织下，迅速进入解放区，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商建国大计。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各民主党派经中共的帮助，克服了内部的分歧，批判了旧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顺利筹建作出了贡献。同时，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也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国民党统治下的在野党，转变成为在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中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新型政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民主党派相当一批领导人和成员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以及各级地方人民代表会议、政协会议，与中共一道，共商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还有相当一大批的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担任负责人，在中共的领导下，为恢复国民经济和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开创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成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并在新中国国家政权管理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和发挥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各民主党派在中共的领导下，在宣传教育和动员组织民族资产阶级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作出了贡献。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派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转变成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各民主党派与时俱进，其地位又一次发生了深刻变化。

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新方针，为此，各民主党派肩负了更为重大的政治责任，即在参与国家政权管理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要对执政的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在1957年初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的号召，帮助中共整风。当时，各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人和有关人士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整风座谈会上，给中共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在这些批评、意见和建议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而且不乏具有政治远见和战略意义的正确主张。各民主党派真诚地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方针，为社会主义初期的民主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显示了初具参政党性质的中国民主党派在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中，各民主党派一度被视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然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之下，民主党派又被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看待。为此，民主党派失去了建国以来应有的政治地位，不

能再在国家政权管理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文革”十年，民主党派被所谓群众专政视为“反动党团”，其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关一律被迫关闭，党派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处于瘫痪之中。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广大成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但他们在身居逆境和备受打击的情况下，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并与广大共产党人一道，为维护党的正确领导，为捍卫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进行了不懈努力，表现了难能可贵的精神。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新时期的拨乱反正中，中共中央重申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方针，并对民主党派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民主党派在恢复其组织活动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参与国事活动，广大党派成员亦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82年，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新方针，同时也把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政党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民主党派的参政党性质也臻于成熟。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制定和实施，正式确立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同时，中国民主党派作为国家政权管理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党地位也终于确定下来了。

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民主党派由旧中国的在野党逐步发展成为新中国的参政党。这一历史演变过程，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反映，也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各民主党派在与中共的团结合作中，由改良到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发扬爱国和民主传统，不断作出历史贡献的过程。

崔珏同志在近年的教学中，对中国民主党派历史的研究颇有心得。在本书中，崔珏同志从民主党派在中国政党史中地位变迁的新视角，去回顾民主党派过去，展望其未来，以求更准确、更实在地去认识在当今社会主义中国的政党制度中，民主党派存在的意义及其活力所在，这一有益的尝试，给我们展示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朱新镛

1998年6月于广州三元里

目 录

序

第一章 中国民主党派的出现 (1927—1931)	
.....	(1)
一、“中国到那里去?”	(1)
二、第三党的创建及其政治主张	(6)
三、第三党与国共两党	(15)
第二章 “抗日反蒋”中间党派的纷兴 (1931—1937)	(21)
一、抗日反蒋中间党派的涌现	(21)
二、领导救亡运动，促进团结抗战	(32)
第三章 抗战时期的第三方面政治力量 (1937—1945)	(40)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	(40)
二、由非法党派成为国民参政会“来宾”	(48)
三、积极推动民主宪政运动	(55)
四、民主党派走向联合，成为第 三方面政治力量	(61)

第四章 民主党派“中间路线”的终结 (1945—1947)	(80)
一、战后民主党派的又一次纷兴	(80)
二、民主党派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努力	(90)
三、民盟被迫解散，“中间路线”终结	(96)
第五章 民主党派的历史性转变 (1947—1949)	(101)
一、公开声明与中共实行密切合作	(101)
二、支持和参加解放战争	(112)
三、参与筹备新政协会议和 创建新中国	(121)
第六章 民主党派在建国初期的参政议政 (1949—1953)	(126)
一、参加中共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	(126)
二、修改政纲与整顿组织	(130)
三、民主党派成为“新民主主义 性质的政党”	(137)
四、在三大运动中与中共密切合作	(140)
第七章 过渡时期的民主党派 (1953—1956)	(145)
一、配合中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45)
二、“八字方针”奠定了新型的	

多党合作关系	(153)
第八章 民主党派的曲折发展阶段 (1957—1976)	
.....	(162)
一、统一战线内部的民主活跃空气	(162)
二、民主党派遭受反右斗争扩大化冲击	(172)
三、中共实施“弛”的方针缓和党派关系	(177)
四、在“文革”中经受严峻考验	(185)
第九章 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恢复和发展 (1976—	
1989)	(193)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新的起点	(193)
二、中共对民主党派性质地位的再认识	(196)
三、民主党派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200)
四、多党合作进入新阶段	(203)
第十章 参政党地位的确立 (1989—)	
.....	(209)
一、民主党派参政党地位的确立	(209)
二、参政党职能的发挥及其前景	(215)
后记	(220)
主要参考书目	(221)

第一章 中国民主党派的出现

(1927—1931)

一、“中国到那里去？”

现代政党的产生，往往是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促成的。中国最早的民主党派，创建于大革命失败后特殊的历史时期。

1924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当时中国政坛影响最大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使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共两党不仅共同创立了黄埔军校，组建了国民革命军，而且于1926年夏举行了北伐战争，把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使国民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北洋军阀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虽然中共希望通过同国民党的合作增强革命的力量，但第一次国共合作毕竟是以国民党为核心的两党合作，随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消涨，左右派之间的矛盾与分化，都使国共合作孕育着严重危机。1925年3月孙中山去逝后，8月，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被右派暗杀。而国民党内出现了研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戴季陶，戴季陶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儒学化，把三民主义纳入中国传统伦理的范围，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遭到阉割。他还将其民生

主义研究延伸到社会领域，提出组织团体具有排他性，主义与主义之间不可能联合，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戴季陶的理论，为国民党右翼势力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加之当时中共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了国共合作的破裂。

1927年4月—7月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驱逐共产国际代表及苏联顾问团，展开大规模的“清党”、“清共”运动，镇压工农运动，国共合作破裂，中国陷入内战状态。

“中国到那里去？”

大革命的失败，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探讨和争论，也带来了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各种政治力量高举着自己的旗帜即思想理论，设计中国发展的道路，开始了一场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角逐。

1.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革命前途的论战。

在中国革命由北伐战争的高峰骤然转入低潮的情况下，一部分大革命中满腔热忱投身革命的人陷入了苦闷、彷徨的境地，但更多人由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的产生了种种疑问，进而开始对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其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首先摆在了人们面前，因为对社会性质的认识，直接关系到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样的革命。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的思想领域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进入了一个异常活跃的时期，代表各个阶级、阶层的政治家、思想家围绕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论战中，总体上

看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二是认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或称民权革命，平民革命；三是认为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要进行的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争论的焦点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当时，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特殊性，社会内部生产关系的复杂以及外国势力的侵入，使中国不是某种“单纯”的社会形态。例如陶希圣在《新生命》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文章，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自帝国主义入侵后新生了“资产阶级”的“宗法封建社会”。王学文、潘东周等人则在《新思潮》发表文章，从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入手，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存在，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大桎梏，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有发展，但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优势的仍然是封建经济关系，而中国的社会性质只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严灵峰等人则受大革命时期苏共党内托洛茨基观点的影响，坚持认为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当时，中共以积极的态度投入了这场论战。李立三等人撰文首先批驳了党内的一些错误观点，诸如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目前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等等，坚持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中共正是根据这一基本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处于国共两党之间，作为中国中间阶级、阶层政治代表

的一些人士，也在论战中提出了自己的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如邓演达提出中国社会处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下的“前资本主义的时代”。从而为他进一步创立平民革命理论提供了依据。邓演达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与中共基本相同，因而中共与邓演达创立的第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实质上存在着很多的一致性。

这场思想领域的论战，后来延伸到对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探讨，它不仅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也引起了中共以及一些中间党派对土地问题的重视，有的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革命的重要任务，有的直接从农村建设探讨中国发展的道路。可见，这一时期思想领域的论战，对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在大革命失败后，继续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起到了提高认识，辨析方向的作用。

2. 面对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中国的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都在进行重新思考，重新选择，各种政治力量开始了新的分化组合。

中国国民党内一直存在的左右两大派别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出现了大分化。右翼势力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在一致反对三大政策的前提下，实现了宁汉合流。蒋介石集团在经过“二次北伐”及“东北易帜”后，终于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建立起国民党一党独裁政体，确立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地位。而以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则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共独裁政策，指出国民党“已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1927年8月，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柳亚子、屈武等，联合共产党人林伯渠等，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

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等“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他们逐步从国民党内分化出来，寻求实践孙中山三民主义理想的新途径。

当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仍然继续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希望建立一个“左派的国民党”，维持国共合作。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当时仍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直至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后，中共才彻底放弃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努力，领导一部分工农武装转入农村，走上了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变化。1927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虽然克服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对反共屠杀极端仇视，对右倾错误极端愤怒的情绪，却为“左”倾错误的出现埋下了隐患，表现在对国民党左派以及中间势力的问题上，由联合变为了敌视。一些中共党员或出于对共产国际某些错误指导不满，或出于对“左”倾政策不理解，或出于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脱离了共产党。有的开始从事创建新党的活动。

此外，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阶层，他们中的一部分依附了国民党政权，一部分则采取了观望态度，既不赞成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不赞成共产党的“左”倾政策，而希望在国共以外另辟一条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

二、第三党的创建及其政治主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及思想状况，为新党的产生提供了适应的环境。最早出现的民主党派是第三党，它是当时社会上对1928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和1930年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统称。

1. 第三党的创建活动

在这一时期最早从事建党活动的是邓演达、谭平山等。

谭平山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在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十分器重他，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在国共两党中均有很高威望。在大革命中，他最早提出了成立第三党的设想。

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右派开始不断制造反共事件，使中共内部对国共实行的党内合作形式出现了不同看法。1926年11至12月，谭平山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扩大会议。在大会发言中，他对当时中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第三党问题。他认为，当前中国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团结革命力量”，而关键是国民党问题。“所谓国民党问题，我们指的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么在现在的国民党内组织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控制，清除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要么不要国民党而成立新的第三党，例如工农党或联合党。”在具体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他认为成立第三党“暂时只能作为尚未定型的趋势存在罢